

錢鏐研究

第十輯

錢鏐研究

钱 镠 研 究

第 十 辑

钱 镠 研 究 会 编

二〇〇二年二月

目 录

·研究与探讨·

- 吴越国海外邦交 钱济鄂 (1)
- 吴越文化：杭州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 江成器 (8)
- 《初探》一文答问并补遗 许扬本 (12)
- 恩泽昭昭武肃王 胡月耕 (14)
- 为吴越国奠基的“钱镠与刘汉宏作战”剖析
..... 杨一平 (16)
- 白石钱氏及其南宋六儒 邱星伟 (26)
- 吴越思源话钱镠 陶福贤 (29)
- 吴越国王钱镠传位与遗训 钱四青 (37)
- 莫让钱王祠在杭州消失 钱南欣 (41)
- 武肃王钱镠保境安民开拓吴越的基本国策 钱百阔 (47)
- 钱镠“镇压黄巢义军”辨 朱馥生 (62)

·钱氏后裔·

- 风华绝代钱钟书 陶福贤 (66)

·史迹考证·

- 洪桥西华村有支吴越王的后裔 钱楚臣 (76)
- 源自浙水 墩湖两系
——无锡钱氏初探 钱志仁 (78)
- 钱王与钱塘 陈利生 (89)

嵊州钱氏最大的聚居地——长乐	钱大莘	(92)
钱镠·闻丘方远·洞霄宫	许圣元	(99)
无锡惠山钱武肃王祠考略	钱志仁	沙无垢 (103)
七房桥考述	钱志仁	沙无垢 (105)
钱文子墓在白石发现	邱星伟	(113)

·信息台·

吴越国王陵功臣塔列入全国文保单位

.....	朱晓东	孙 磊	(114)
-------	-----	-----	-------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吴越国王陵”揭牌

仪式上的讲话	王 坚	(116)
浙江省文物局贺词		(119)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贺词		(120)
上海地区钱氏后裔祝贺信		(121)
钱大方、钱永健祝贺信		(123)
功臣塔抒怀	方 犁	(124)
漫谈钱王故里的吴越文化古迹	管康林	(126)
一封云南与上海钱氏后裔的交流信	钱镇国	(129)
石雕《钱王功绩图》获大奖	陶福贤	(133)
2001 年度省级以上领导视察钱王陵情况		(134)

·吴越文物·

目击雷峰塔千年地宫发掘

.....	杨 猛	洪光豫	肖向云	(135)
雷峰塔的秘密之地宫宝藏	黎毓馨	郑嘉励		(140)
雷峰塔地宫有珍贵文物	屠晨昕	胡志弘		(142)

雷峰塔的秘密之来龙去脉	黎毓馨 郑嘉励	(144)
舍利函今天开启	王 倩	(150)
雷峰塔地宫舍利函成功开启		(151)
神秘铁函不再神秘六件国宝撩开面纱	金振东	(152)
“武亭”原来是塔	王 倩	(154)
雷峰塔旧闻新说	王 倩	(156)
雷峰塔背后的故事	魏 若	(162)
细品文化看沧桑	王 倩	(166)
从千年地宫开启看重建雷峰塔的旅游文化价值	游 宗	(170)
雷峰塔最终定稿	王 倩	(172)

吴越国海外邦交

钱 济 鄂

史云：“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此国王，乃梁“以繆为尚父、吴越国王”。后唐庄宗册“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封吴越国王”。足见，非自称。既是，焉能谓为伪行？何谓夷落？古惟有庐落，见后汉书：村落，见白居易诗、史记注。

记云：“遣使册新罗、渤海王，海中诸国，皆封拜其君长。”册，谓两国间之礼也。故皆封拜也。亦即交聘也。

初，王筑杭州新夹城五十余里。尝亲运一甃。复新筑罗城七十里，亦称新城，共有十门。为使城池坚固，不虞敌人来犯也。

后，又造捍海石塘；遣石工，填平钱塘江暗礁罗刹石。因航道拓宽，始进而建造远洋舟楫。庞大海运筹划，乃为之实现。以所有易所无之贸易，遂一一展开矣！

当时，可以将巨大船舶，从杭州启碇，由海道至登州、莱州停泊。改行陆路，赴北方进贡，以及促销己货，繁荣经济。因此有“吴越泛海通中国，于是沿海置博易务，听南北贸易”。谓王设置两浙博易务，为就便，处理一切事宜也。

此举，实大有帮助造船暨航海事业之开拓。使吴越与海外诸国信使、商贾、僧侣等之交往，益为频繁。诸如：印度伽南木雕沉香扇；二主未诞；“有胡僧，持一玉羊，大可数寸，光彩异常以献”。见备。“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沈水近千斤，叠为旖旎山，象

衡岳七十二峰”。见清异录。十国春秋云：“是时，海舶献沉香扇一具。高尺余，剡镂若鬼工。（忠懿）王号为：清门处士”。“高丽舶主王大世，选沉水（木）千斤，叠为旖旎山，象衡岳七十二峰。王许以黄金五百两，竟不售”。随手杂录云：“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伽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晶。云：可厌十里火殃。乃置于龙兴寺佛髻中。余杭数回禄，而龙兴不可近也。”可惜不知，是外国，乃何国耳。时有珍宝奇器，源源而至。

吴越国之海外邦交，备无载。然以今日仅存少数记载，亦可想见，旧日经营，规模为如何也。

昔年，吴越之遣使，东到日本：北往高丽、契丹；南迄林邑、婆利；西至大食、波斯。近岁，澎湖尝数发现吴越沉海货瓷。可说所过之处，地域远廓。商贾所至，无不广受欢迎。

斯时，海运甚发达。“八九百里鸡林、日本、琉球、閩婆，万斛之舟，卯发而辰至”。见浙江观潮赋。国内各地，亦皆置博易务，以通商。故五代史记刘侏传云：“是时，江、淮不通。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见联注四十三。

与日本，缔交尤密。吴越宫殿虽不多。然有“以日本国松木，为翠寒堂。不施丹牖，白如象齿，环以古松”。见十国春秋。

造钱塘之巨木材，即来自日本。时地名，有楞营。见联注四〇〇。

因台州天台山，自隋智凯居此，开辟天台宗，以法华经为本，智度论为旨，涅槃经为辅，大品经为观，人称智者大师，有声于世。下传至吴越，故益显。时有日本国兴福寺僧宽建，于延长四年（九二六、王薨前六年）上奏，欲渡海，礼佛五台山，拟带日本名诗集前往。遂准赐管原道真等四人著九卷，书法家水野道风行草各一卷，令其传播。又赐金五百两，助行。见扶桑略记、在唐记。后一书称，随行僧澄觉，于长兴年间（九三〇—九

三三)尝多次赴两浙宏法。肥前国延历寺僧日延,则自二主起,遍历吴越各地。参拜天台山后,于五主时,携金涂塔归日。五主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十二月,命造金涂塔,见吴越史事编年记。乘云:“以五百,遣使颁日本”。是塔,两浙金石志云:“塔高六寸三分,重三十六两,四版合成。外,俱绘梵夹故事。塔内,正书:吴越国王钱宏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九五五)记。下有人字,保字,皆铜质。张廷济于武林市中,又得铁塔。款识,已锈蚀”。乘作“用五金铸”。可见或杂有金、银、铁、锡等。曝书亭集卷四十六,则称乃武肃王作。非。备无载。梵夹,佛经也。

与日本国缔交,日本朝文粹载自承平五年(九三五)起,双方藉商船,尝互托国书,达十余次之多。尤其天历元年(九四七),日廷收到三主国书、礼物后,由后江相公起草,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加沙金(二百两)送文云:蒋“袞等逆旅之间,聊加慰问。边城程远,恐有疏忽。今交关已毕,归帆初飞。秋气凉,伏惟大王,动用兼胜。即其祖遣”。古朴之至。聊,且也。见诗经。祖,祭道路神,出行也。见左传。具见商人在国外,已受到礼遇。天历七年,五主尝愧以锦绮等。日本纪略载承平七年(九三七)十月十三日,命大宰府,搜集吴越商船,所用当年及次年历书。天德元年(九五七)有“大唐吴越持礼使盛德言上书”。计二则。吾国皇朝类苑载“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宏俶(五主)买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

元人唐诗鼓吹笺注,载皮日休诗。题为: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诗云:“讲殿谈余著赐衣。椰帆却返旧禅扉。贝多纸上经文动,如意瓶中佛爪飞。飓母影边持戒宿,波神宫里受斋归。家山到日将何日,白象新秋十二围”。

首言上人讲论之余,蒙王赐衣之宠,足见宾主融洽。白象:

树名。据酉阳杂俎称，乾陀国头河岸，有系白象树。花叶似枣，冬季方熟。相传此树灭，佛法亦灭矣！为计上人到日本，应是七月也。

另载诗一，则为送新罗国名僧也。题为：庚寅岁新罗弘惠上人与本国同书请日休为灵鹫山周禅师碑将还以诗送之。诗云：“三十麻衣弄渚禽。岂知名字彻鸡林。勒铭虽即多遗草，越海还能抵万金。鲸鬣晓掀峰正烧，龟睛夜没岛还深。二千余字终天别，东望辰韩泪洒襟。”

首言上人年三十，犹未遇，祇与渚禽相狎。然名字，却遍传鸡林国也。鸡林，即新罗国也。汉时称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也。见后汉书。

十国春秋云：释“延寿声被异国，高丽王常投书问道，执弟子礼。奉金丝织成伽梨水晶数珠、金澡瓶等。遣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证。相继归国，各化一方”。

时之吴越，素尊重文士，因此人才特盛。东国通鉴云：“新罗景明王七年，吴越国文士朴岩，投高丽”。十国春秋云：吴越天宝十六年（九二三）“六月，我国文士朴严，由新罗，投高丽。为春部少卿。是年，使于（后）唐”。近代，韩人姓朴者，未审是朴公之后否。虽非为吴越礼聘之士，一旦楚才晋用，亦能立致荣身，足见不凡。

王不仅图己国安定，尝于后唐同光三年（九二五）十一月，遣通和使者，先往高丽，后赴百济调解。时二国，正构兵交战。从事睦邻，调停海外纠纷，不以为厌。故朝鲜史略云：后百济国“甄萱袭（高丽国）高郁府。今蔚山郡。猝入王都。时王出游鲍石亭，忽闻兵至，仓卒不知所为。与夫人走匿城南离宫。侍从、僚、官人、伶官皆被陷没。萱索王弑之，强辱王妃。乃立王族弟金传，为王。（高）丽王亲率精骑五千，邀击萱，于公山桐蔴败绩。大将申崇谦、金乐，皆死于兵。后萱，因吴越王贻书请和，

高丽王为书报之”。是年，“高丽王始定官制”。彼之纪元，为高丽国高丽太祖八年，后百济国甄萱三十四年。

然十国春秋云：宝正二年（九二七）“冬十一月，遣尚书班（闕文）为通和使。如高丽、及后百济甄萱。时萱与高丽王，构兵也”。东国通鉴则云：“新罗景哀王纪载甄萱三十六年，是为高丽太祖十年冬十二月，莹贻书于高丽，求和曰：前月七日，吴越国使班尚书至，传王诏旨，云云，明年春正月，高丽王答萱书曰：伏奉吴越国通和使班尚书，所传诏书一道。兼蒙足下辱示长书，叙事者云云”。何年与前不同，相差三年？或为误书。岂又一次遣使乎？

时吴越外交使臣，亦人才卓越。亦有足智多谋，擅辩贍，口若悬河，不辱使命者。故十国春秋云：“滕彦休（闕）人，幼岐嶷，有辨才。天宝八年（九一五），出使于契丹，大得契丹心。明年，复报聘。会契丹兵，攻梁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乘之。不逾时，而破。契丹主引彦休，环城以视。因赐彦休名曰：述吕。十三年（九二〇）五月，武肃王后令彦休使契丹。兼馈犀角、珊瑚诸物。契丹主大悦，授彦休官，遣还。彦休往反契丹者，数四。沿海溯河，跋涉险阻。辑睦邻封，为功居多焉”。延揽之为异国之官，王亦许焉。足见开明，君臣合作无间。于礼记云：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王使之自专。王之器局，固不同焉！时非称契丹，应书辽，始合。

按辽之崛起，据云：于辽太祖纪史之前二年（九〇五）冬，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报刘仁恭之役，借辽太祖骑兵七万，“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视此，吾国之失，何止财物而已！次年二月，“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吴越与辽之缔交，乃九年（九一五、贞明元年）十月，吴越王钱鏐，遣滕彦休来贡”。时大唐主亡之第九年。比史、记所言，庄宗入洛（九二三），王始“封爵”“其君长”，犹早九

年。此称贡，彼曰册拜。乃书史称谓，有异之故也。视礼则一焉。又，神册元年（九一六）“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十一月，攻蔚州等五州。“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以下略，皆见辽史。备无。既邀使，观战后梁之勇。彼五代之后的梁，亦一国而已哉，独赐以名，述吕尚。亦见吴越，受远邦之尊重，奚止足与梁使埒，亦更非等闲也。

时之交通，半年之内，即可由杭，往吉林敦化县，来回计四次。海运发达，已可知矣。何以建交如此之遥？或以本土，中隔有吴，得闻中邦消息不易。故谋之于他国也。

滕公之官，辽史云：神册五年（九二〇）“五月丙寅，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此等，皆礼品，非贡方物也。前者可能益薄，故不书。赐官、授官，时梁、唐使，皆无也。足见乃独厚吴越，有殊遇也。或馈礼难得，使之惊，遂有此举也。

与波斯之往来，十国春秋尝有记。只惜前有缺文。忠懿王妃孙氏，“尝以一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寺僧未之珍也。偶出示舶上波斯人曰：此日本龙蕊簪。遽以万二千缗，易去”。乃云五主妃，得此贡品，也知其贵重，遂施舍寺僧。惟外商识货，以今日之价，约一千二百万元购得。全寺出家人，因发一笔大横财。可以终身不愁也！善哉！善哉！既能语言通达，出此高价。两国之贸易，亦想见兴隆通四海矣！

十国春秋云：同光三年十月，王“贡：佛头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等。其中之螺子青，即螺子黛。黛，汉时宫人，用以画眉。妆台记云：“汉，日给宫人螺子黛”。隋遗录则云：此物，“号为蛾绿。螺子黛，出波斯国”。南部烟花记则云：“炀帝宫中，争画长蛾。司官吏日给螺子黛，五斛。出波斯国”。

备云：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王得此，用于海战。见联注

四三七。

波斯，即今伊朗。大食，今之阿拉伯也。

史料纵不多。足知当日，吴越之盛况，几已空前。于敦睦远域邦交，开拓贸易而言，诚襟抱恢廓，无远弗届。谓为飞黄腾达，意气扬扬，并不为过也。

斯时五代列国之君，率以鱼肉子民，自相残杀为乐。养尊处优，声色犬马之好是务。又有几国几主，文武并重。保境安民。大兴农桑水利。兼能虑及，寻求拓展海外，营运贸易之业？念念不忘，为民求富？致国于裕？

吴越文化： 杭州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

江 成 器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教科书，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在，开拓未来。综观杭州的历史文化，五代吴越文化就像一朵绚丽的奇葩，在杭州的文化史上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吴越文化是杭州历史文化的代表

杭州历史悠久，如果从良渚文化时期算起，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等比较清晰的序列，而吴越文化则是杭州历史文化的代表。

吴越文化是一种昌盛的都市文化。杭州是全国的七大古都之一，最早建都是从公元 907 年钱镠在杭州建立吴越国开始的。而在吴越建都杭州后，杭州成了我国东南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为南宋时成为全国第一大都会、世界上十大城市之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吴越文化是一种精品文化。杭州的吴越文化代表了当时国内文化的最高水平。一些行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如，五代吴越瓷器已经发展到炉火纯青、臻美完善的境界，尤其是秘色瓷堪称一绝；杭州吴越时期雕版印刷数量巨大，是当时全国的雕版印刷中心之一；杭州佛教始于两晋，盛于吴越，享有“东南佛国”的盛名。

吴越文化在杭州的历史文化中独树一帜。吴越文化作为一种都市文化，其建都时间长，政治地位高，经济成就突出，文化形象积极向上。而且，吴越文化的文字记载相对比较完整，历史遗存也相对较多，因此，吴越文化在杭州众多的历史文化中颇具代表性。

吴越文化具有极强的现代性

吴越文化的现代性首先表现在文化精神上。吴越文化具有理性的、发展的、开放的精神，在现代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理性精神是指吴越国君王具有很强的政治理性和人文理性。吴越国三代五主始终坚持“纳土归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三大国策，才使吴越国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求得了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吴越文化还表现出很强的开放精神，一方面吴越国积极实行对内开放和交流，与吴、南唐、闽等邻国以及中原各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另一方面，吴越国还积极开展海外交流，与古代朝鲜半岛上的新罗、高丽、百济诸国通和修好，与日本、印度等建立了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交往。

吴越文化的现代性还表现在其文化的现实参照性上。一是发展阶段的特点具有现实的参照性。吴越时期杭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从隋、唐起步到南宋达到高峰的过渡期，这一阶段承上启下，至关重要。同样，现代的杭州也处在类似的发展阶段，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杭州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未来杭州的发展目标是至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繁荣走向辉煌”，是杭州新世纪发展的主题。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实现杭州的复兴，重铸杭州的辉煌，吴越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二是在区域发展的定位上具有参照性。吴越时期的杭州是我国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作为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应利

用现有的基础和条件，在我国东南部确立文化、旅游中心的地位。三是在大都市建设中具有参照性。前不久，杭州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大的调整，撤销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设立了杭州市萧山区、余杭区。“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是杭州行政区划调整后提出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强化大都市范围内文化的认同。吴越文化是杭州所有区、县（市）共同的文化之根。尤其具有针对性的是，吴越时期，杭州是我国东南部的第一大都市，被誉为“人间天堂”。因此，弘扬吴越文化，十分有利于促进大杭州范围内文化的认同，推进杭州“大都市、新天堂”的建设。

关于开发利用吴越文化的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吴越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一直以来，杭州的吴越文化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崇。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吴越文化的研究不够，对吴越文化的宣传也明显不足。明年是吴越国王钱镠诞辰1150周年，我们可以组织开展一次国际性的吴越文化研讨会，倡导和推进对吴越文化的研究。同时，应通过各种媒体，采用多种方法，介绍杭州的吴越文化，提高广大市民对吴越文化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值得一提的是，从吴越时期现存的史料看，无论是文武双全的钱镠，还是文采过人的罗隐、造塔高手喻皓、大画僧贯休等著名人物，个性鲜明，经历传奇，成就非凡，这些都为艺术刻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是大力倡导吴越文化精神，激励杭州人为重铸辉煌而努力拼搏。城市的文化精神是一座城市活的灵魂。杭州的城市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文化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何从丰富、繁杂的文化精神传统中，挖掘、弘扬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精神，它不仅能使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保持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而且，还能增强广大市民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吴越文化充满理性的、发展的、开放的精神，它具有艰苦奋斗、

奋发向上、开放兼容、精致和谐等特点。我们完全应该大张旗鼓地加以提倡和弘扬。

三是推出吴越文化线，整合大杭州的文化资源，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字记载上，还应有一定的物质形态上的体现。相对来说，杭州吴越文化的遗存还比较多。目前杭州保留下来的绝大部分名胜古迹都是在钱氏家族手里建起来或修造的，而且，遗址分布很广。临安是钱镠的故居，其遗址众多就不用说了。杭州城区内的吴越文化遗存也很多，而且大部分遗址都分布在风景区，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吴越国当时所辖的区域范围很大，除了囊括整个大杭州外，还包括浙江的湖州、嘉兴、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福建的福州和江苏的苏州、无锡等地，以及安徽的一小部分。这些地区都有吴越文化的遗存和遗迹。因此，完全可以根据吴越文化遗存，分别推出西湖风景区内、大杭州范围内、纵贯全省乃至连接江苏、安徽、福建等地的吴越文化线。在此基础上，旅游部门可以安排出几条吴越文化特色旅游线，吸引国内外游客。特别要强调的是，杭州要用好“东南佛国”这一金字招牌，要以吴越的佛教文化为主题，把杭州建成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还可以以吴越佛教文化为线索，把杭州与江苏、安徽、福建等地的有关佛教名胜串起来，推出一条在国内乃至世界上著名的佛教文化黄金旅游线。

四是打钱氏家族牌，吸引钱氏的杰出人才，为杭州建设和发展服务。钱氏的后裔很多，分布在世界各地，许多很有成就。寻根、祭祖，这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我们完全可以打钱氏家族牌，举办一些祭祖、寻根等有意义的活动，吸引钱氏的杰出人才汇聚杭州，为杭州发展出谋划策，到杭州进行投资创业。

《初探》一文答问并补遗

许 扬 本

“《钱怀柔明王庙记》碑文的发现及内容初探”一文（以下简称《初探》）在《钱镠研究》第九期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钱镠研究上的新材料、新突破。因为过去一般关于钱镠的学术论文，大多还是根据史书上现成的文字记载，未能越出前人的窠臼。而碑文却不然，它是新发现的实物资料，且内容与史书所载有明显不同，值得格外重视，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认为是钱镠学术研究上的新篇章。

在得到好评的同时，人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主要为两个。一是纳土归宋后，钱俶的死既有疑问，其子孙辈又隐于临安的深山寒谷，这样的结局，如何还能作为一个历史榜样，被引喻来借鉴当前？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对此一课题寻根究底下去，以免画蛇添足，就此止步即可。另一种意见则恰恰相反，要求从事钱镠研究的人们，能找出更多有力的旁证，来证实钱氏纳土后的结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即使钱俶不是善终，也并不影响这一事例的典型性和历史进步意义。

笔者理解第一种人的心情，但对他们停止研究此一课题的主张不敢苟同；对第二种意见，则基本上表示认可。

一、研究历史，当然要遵循“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方针，服从并服务于当前的政治。但这是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的，虚构或隐讳某些历史事实，以迎合当前现实政治的需要，必然是经不起检验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态度。